

外国卷之一

1

THE COURSE OF HISTORY TOWARDS
THE FIRST RATE

走向一流的历史轨迹



中外著名大学校长
治校理念与办学制度文献选编

赵卫平 —— 编



外国卷之一

1

THE COURSE OF HISTORY TOWARDS
THE FIRST RATE

走向一流的历史轨迹



中外著名大学校长
治校理念与办学制度文献选编

赵卫平——编



浙江大学教育史
国家重点学科丛书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一流的历史轨迹: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治校理念
与办学制度文献选编. 外国卷之一/赵卫平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308-14767-5

I. ①走… II. ①赵… III. ①高等学校—校长—学校
管理—世界—文集 IV. ①G64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1877 号

走向一流的历史轨迹(外国卷之一)

——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办学制度文献选编
赵卫平 编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谢就宇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515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767-5

定 价 9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政府“211 工程”、“985 工程”的相继出台,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迄今已近 20 个年头。多年来,人们都习惯于把这种发展称为“跨越式”,意即跨过或超越了某种本来应有的状态或某个本来必经的历史阶段,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以此衡量,其实,百年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前此已经有过两次“跨越式”发展。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比较集中在 1921—1926 年的五年左右时间。据统计,从 1921—1926 年,公私立大学由 13 所增加到了 51 所,5 年间增加了 3 倍。学生数增加也比较明显,1925 年的在校生总数是 1916 年的 2 倍多。各高校毕业生数亦呈上升趋势,1926 年是 1921 年的近 2 倍。可见,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无论学校数、学生数还是毕业生数都快速增长。时人曾这样评论:“中国近年来的大学迷,可以说是发达到极点了;改革的声浪,到处听见;新成立的大学,也如春笋暴发。”^①高等教育短时期内的“跨越式”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幅攀升的数字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数量增加,质量无法保证。尤其是私立高校纷纷设立,以致“盈利大学”、“野鸡大学”充斥各地。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一个时期,此风仍在继续,何炳松批评说:“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二三年间实为我国大学教育史上最活动最复杂的一个短时期,比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和民国十二年两次的大学运动还要热闹。”^②社会上“大学教育破产论”、“大学教育崩溃论”沸沸扬扬,于是有南京国民政府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大力

① 庄泽宣:《中国的大学教育》,《清华周刊》1926 年(纪念号增刊),第 84 页。

② 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之中国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122 页。

整顿。整顿工作以“限制数量、提升质量”为目标,包括取消单科大学、限制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高校(包括教会高校)的控制与管理;调整院系结构,注重实用科学;提高教育效能等方面。经过五六年的努力,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才逐步稳定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教育、教学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第二次“跨越式”发展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称之为“教育大革命”或“教育大跃进”,具体而言是1958—1960年的三年左右时间。195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是229所,至1960年扩增至1289所,当时的一个响彻云霄的口号是“县县办大学”,是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100%,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扩大远远超过前述20年代时的所谓“春笋暴发”。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大力压缩,至196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回落为407所。^①后人在总结这次“跨越式”发展的教训时认为,“在三年教育革命中,教育的发展严重地脱离了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可能,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造成了学校布局和专业设置的不合理。”^②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两次“跨越式”发展,且不论它们前后相隔了30多年,世易时移,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也不去探讨它们各自兴起和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原因有多少不同,就其结果而言,应该说是高度雷同的,那就是都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挫折,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迎来的第三次“跨越式”发展,潮头似乎已经过去,它所导致的中国高等教育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用不着列举一大堆数字,也足以让60年代的那次“跨越式”自惭形秽而望尘莫及。时至今日,关于最近的这次“跨越式”发展所带来的一切积极的方面,人们如数家珍,已经列举出许多。但是我总感到,也许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吧,目前的评价总难做到比较客观、全面,而且显得匆忙了点。当然,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应该说是从未间断。因为,现在的大环境,毕竟与30多年前大不一样了。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内涵

^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235页。

^②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

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一些词汇,如“大跃进”、“大革命”、“迎头赶上”、“跨越式发展”等,会成为不同时期国人从上到下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这种现象是否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近代以来的屈辱地位有关?是否与我们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角色有关?40多年前每当读到康有为写于19世纪末的这段话时,总让人感到热血沸腾,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劝告光绪皇帝:“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①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知识的积累,慢慢悟出诸如此类的话语更多的是维新志士或改革家、政治家们带有宣传、鼓动性质的口号,更多地具有理想化色彩,社会的发展不大可能是这样的,更遑论文化教育的变革更新!

现在回到读者诸君面前的这套《走向一流的历史轨迹——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办学制度文献选编》。最近20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有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大量涌现、层出不穷。这些成果从不同层面推动着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其中的许多成果为政府决策、高校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跨越式”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摇旗呐喊的重要作用。但是,综观这些成果,多为对各国现行高等教育政策、中外著名高等院校(包括民国时期我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现状的介绍与对策性研究;较少从历史上分析考察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和中外著名大学走向辉煌的内在原因、揭示这些大学具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的活水源头。众所周知,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的体现,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任何一所著名大学的形成和出现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都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都凝聚着这所大学几代校长的治校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考察著名大学形成、发展和走向辉煌的历史轨迹,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对我们实现“建成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发展目标,或许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得到一些启迪。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的几位同仁,从2010年开始,酝酿编辑一套体现上述想法的资料书。经过多次讨论,大家达成如下共识:

^①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4页。

第一,本书的编写目的,是选择、整理世界和中国的著名大学在走向一流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重要足迹;不是编辑这些大学的校史资料,更不是编辑这些大学的创办者(或其他教育家、政治家)的教育论著集。

第二,有鉴于此,对于入选的人物而言,我们选择的是他们在办学过程中(或教育生涯中)所发表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所主持的学校或他所在的国家(民族、地区)某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言论和著述,强调原创性。

第三,对于入选的学校而言,大致是两个侧重点。一是在这所大学走向一流的几个重要“节点”上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的那些文献,换言之,如果没有了这几份重要文献,这所大学也许就难以成为我们的入选对象,我们瞄准的是这样性质的文献;二是这些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文献。二者相较,前者更为我们所关注。

全书共四册,分为中国卷和外国卷,各两册。上册分别是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政治家)有关高等教育和大学办学理念、治校方略的内容;下册是著名大学的相关文献。

据我们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了解,学术界迄今为止还未曾提供过一种比较系统地收集有体现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政治家)办学理念、中外著名大学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所形成的重要规章制度等重要文献的资料性出版物。应该说,对于从源头上深入研究、汲取、借鉴中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以为现实服务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而对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而言,这更是一项亟待加强的基础性工作。为了迎头赶上或跨越式发展,熟知、把握学习对象的今天固然十分重要;而为了步子稳健、少走弯路,了解、认识她们的前天和昨天同样重要。因为今天的她们是从前天、昨天一路走来的。

我有幸参加了全书的酝酿、策划和前期工作,深知在目前学术环境下编辑、出版此类资料性成果的艰辛。如果这套书能像一块小小的铺路石子,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一流的漫长进程中,提供一点方便、发挥一丁点作用,作为教育史工作者,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是为序。

田正平

甲午年中秋节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本卷编者说明

一、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办学制度文献选编”。列入本卷选编范围的外国 14 位作者,其中八位(艾利奥特、赫钦斯、克尔、博耶、博克、卢卡斯、杜德斯达和雷文)曾经是西方著名大学的校长,另一位(纽曼)也担任过大学校长;其余五位虽未曾担任过大学校长,但他们中的四位(包尔生、弗莱克斯纳、加塞特和雅斯贝尔斯)曾在著名大学任教或工作;另一位(洪堡)则曾经担任普鲁士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直接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所以这 14 位作者对西方著名大学和高等教育均非常熟悉,他们发表的有关大学和高等教育的论著留下了重要的历史痕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二、收入本卷的论著,按作者出生年份先后排列;同一位作者的论著,按发表或出版年份排列;全部论著的写作年份均止于 2000 年。

三、对原译本个别页下脚注的内容做了更新。对原译本中明显的错字做了订正。

四、译名均用原译名,未做改动。

五、谨向入选论著的原译者和原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5 年 1 月 15 日

版 权 声 明

本书选编的外国教育论著,编者虽经多方努力,但仍无法与其中部分作品的权利人取得联系。如果本书选入了您的作品,请您与本书主编联系。联系方式为: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邮政编码:310028

联系人:赵卫平

E-mail:jyx@zju.edu.cn

您也可以知会本书责任编辑,由责任编辑代您与主编联系。责任编辑的联系方式为:

通讯地址: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310007

联系人:吴伟伟

E-mail:weiweiwu@zju.edu.cn

目 录

洪堡	1
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节选)	2
纽曼	7
大学的理念(节选)	8
埃利奥特	47
哈佛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1869年10月19日)	48
包尔生	70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节选)	71
弗莱克斯纳	109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节选)	110
加塞特	130
大学的使命(节选)	131
雅斯贝尔斯	149
大学之理念(节选)	150
什么是教育(节选)	192

赫钦斯	201
教育中的探索精神(节选)	202
美国高等教育(节选)	206
克 尔	235
大学之用(节选)	237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 世纪的问题(节选)	277
博 耶	315
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节选)	316
博 克	331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节选)	333
美国高等教育(节选)	382
卢卡斯	444
大学与学习社会的挑战(节选)	445
杜德斯达	451
21 世纪的大学(节选)	452
雷 文	494
大学工作(节选)	495
索 引	518
后 记	524

★洪堡

弗里赫·冯·卡尔·威廉·洪堡(Freiherr von Karl Wilhelm Humboldt, 1767—1836), 德国教育家、政治家和语言学家。出生于德国波茨坦。1787年考入法兰克福大学法律系, 翌年转入格廷根大学改学历史和古典文化。1790年毕业后任职于柏林议会法院。1794—1797年在耶拿当家庭教师。1802—1808年担任普鲁士驻罗马教廷公使。1809—1810年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与教育司司长等职, 期间应社会各界的呼吁创建柏林大学。1819年后专心研究语言科学。

洪堡认为, 大学的根本任务一是学术研究, 二是教育。而研究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探索和独立思考。师生的结合, 有利于完成大学的任务。政府应帮助大学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大学实现自己的目标, 也就是为国家服务。

洪堡著作有全集17卷, 其中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文稿主要有《柯尼斯堡学校计划》(1809)、《立陶宛学校计划》(1809)、《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1809)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1810)等, 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大学观。

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节选)

所谓高等学术机构,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其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①,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学术虽非为此而设,但确为适当之材料。

高等学术机构作用,由内而观之,在于沟通客观的学术和个人的修养;由外而观之,则是将完成的中学教育与将开始的独立的大学学习连接起来,或者说促进前后两者的过渡。但其最为关注的惟有学术。只要有了纯的学术,虽然会有个别偏差,(学生)自然会正确领悟和整体把握学术。

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机构才可望实现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寂寞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但是,人类精神活动惟有通过合作才能繁荣;合作不仅能相互取长补短,而且一人之成功会激励他人,并激发出共同的、潜伏于个人的、往往零星或被动呈现的创造力。因此,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组织又必须能够促进和维持成员间持久的、具有内在动力的、非强制性和非目的性的相互合作。使其又有赖于人们相互地合作;合作不仅能取一人之长补他们之短,而且在合作中,一人的成功会鼓舞他人,并激发出一种普遍的、潜伏的力量,它平时在个人身上仅仅是零星地或被动地表现出来。因此,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组织又必须能够促进和维持成员间持久的相互合作;这种合作应当历久不衰,不断更新,但也不能强加于人和用

^① Wissenschaft,亦译科学,但德文中“科学”含义比较广泛,洪堡也是在广泛的含义上使用此字,所以译为学术,似乎更接近原义。

于某种目的。

高等学术机构的特点还在于,它总是把学术视为尚未解答之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中学则仅涉及现成和有答案的知识,以学习为重。因此,高等学术机构中的师生关系与中学迥然有异,教师不是为学生而设,两者都是为学术而共处。教师的工作有赖于学生的参与,否则难以顺利进行。学生即使不主动求教于教师,教师也会去寻找学生。教师虽训练有素,但因此而易于失之偏颇和缺少活力,而学生固然不甚成熟,但较少成见,勇于探索。两者的结合,利于教师实现其目标。

因此,所谓高等学术机构,无非是具有闲暇或有志于学术和研究之辈的精神生活,与任何政府机构^①无关。他们或是独自思考和搜罗材料,或是与同辈交往,或是与学生为伍。政府如欲用固定的形式来规范这种非确定的、甚至任意的活动,就必须尊重其本来的面貌。应力求做到:

1. 使这种活动保持最旺盛的生机。

2. 不使其降格,严格、明确划清高等学术机构与中学(不仅是普通的文科中学、特别是实用性中学)的界限。

政府始终应当清楚,政府其实从来没有、也不会促进这类活动。政府的任何介入,只会产生阻碍作用;脱离政府,其发展会更加顺利。政府之地位,大抵如下:

——在现实社会中,任何大规模的事业都需要外在制度和经费的保障,政府因此具有为学术研究提供这种保障之义务。

——但无论政府如何为其提供组织和经费支持,都会有损于学术;再者,学术与外在制度和经费安排有本质区别,两者结合,必然有消极的后果,精神与高远之物必然坠入物质与低俗之境地。

——因此,仅从弥补政府无辜而促成的损害或阻碍角度看,政府务必一再认清高等学术机构内在的特质。

如果说这不过是同一观点的不同表述的话,也必定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政府由此观点出发,就会不断减少干预。政府的活动离不开思想,而理论上的错误必然在实践中导致失误。

显而易见,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组织的建立,务必遵守一条根本的

^① Staat,亦可译为国家。

原则,即学术是一个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问题,当锲而不舍地探索之。

一旦停止了对学术的真正探索,或者认为学术无须来自精神深处,只需众多资料的堆积而成,那将是无可挽回、永远的损失。不仅是学术的损失,因为学术长此以往将徒有其表;这也是国家的损失,因为学术只有来自内心并作用于内心,才能改变人的性格,而国家正如人类一样更加关注性格和行为,而不是知识和言语。

为了永远避免这一歧途,只需使精神的三重追求保持其旺盛的生机:

其一,根据一种根本的原则来解释万物(例如对自然的解释就是这样从机械论经物力论、有机论最后上升到广义的心理学的原则);

其二,为万物建立一种理想;

最后,把上述的原则和理想两相结合,形成一种理念(Idee)。

当然,这种精神的追求非人力所能左右,而且无人觉得在德国人中还有鼓励这种追求的必要。德国人善于思考的国民性格天然就具备这种禀赋,只是要防止其受到强力或是不可避免的纷争而受到压抑。

高等学术机构当然忌讳偏激,所以其中肯定会有人缺乏、甚至抵制这种追求精神。他们虽属少数,也只是零星出现,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因此,必须形成一种气氛,使认同这一精神者受到尊重,使诋毁这一精神者感到羞耻。

哲学和艺术最集中和突出地具有这种追求意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自身易于萎靡,而且其精神假如不具备这种追求意识,或仅以逻辑或数学的形式或方式转化为其他知识门类和研究类型,哲学和艺术将无所作为。

一旦在高等学术机构中确立了唯学术是求的原则,便无需担心其余的具体事宜。学术既不会缺少统一性,也不会缺少完整性,两者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也是任何优秀学术研究方法的秘密所在。

就高等学术机构内部组织而言,以上所言足矣。

在高等学术机构与政府之间这种外部关系及政府的职能方面,政府的任务无非是通过对人员的选择来形成一支丰富多样(高水平和风格各异)的学术队伍,并使其享有自由。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政府,

同时也来自学术机构内部,因为开创者有了既定的观念,便倾向于压制其他的观念。政府必须预防由此而产生的弊端。

在此,对进入机构人员的选择,尤为重要。在整个机构内部不同部门层面,还可以设置补救措施,以弥补人员选择上的失误。

其次,重要的是制定少量和简要,但深入机构内部的组织法规。这当然也只是针对不同部门而言的。

最后必须提到辅助设备问题。对此只需要一般性指出,不能把添置众多的物质设施视为头等大事。不应忘记,物质设施容易导致精神的迟钝和庸俗,所以最深刻和最有思想的学术成果并不出自最富有的科学院和大学。

就政府对整体高等学术机构的责任而言,政府应处理好高等学术机构与中等学校,及其作为学术机构与实际生活的关系。

政府不可把大学视为文科中学,或是专门学院,也不能把科学院当作国家所属的技术或科学机构来对待。就总体而言(下面还将论及在大学可能会出现个别例外情况),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大学由此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政府的范围,远非政府的种种举措所能企及。

另一方面,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在于使中等学校与高等学术机构进行适当的配合。这里必须明确这两者的关系,中学的任务不在于直接为大学的课程进行准备,也不能仅把大学视为中学教育的简单延伸、只是更高的年纪而已。而应当认识到,中学向大学的过渡是青年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成功的中学教育应当使他们在身体、道德和智力方面发展成熟,胜任自由和自主的生活,离开约束而不无所事事或陷入实际生活之中,而能够在初窥学术之后,抱定进入学术殿堂的崇高志向。

对中学而言,达此目标的途径并不困难,只需使其学生的各种能力得到和谐的发展,借助极少量的教学对象,使其身心得到尽可能多方面的锻炼;在耕种其知识心田时,不可拘泥于外表,而应通过知识内在的精确、和谐和美,来吸引学生去理解、求知和创造性思维。

通过这种培养,心灵会自然地投入到学术之中,而其他的培养方式,即使勤奋和才能一样,也会使学生们要么一俟教育完结、甚至未及

学业结束便沉溺于实际营生活动。他们要么在此难以有所发展,要么追逐一星半点的知识,毫无高远的学术追求。

(选自陈洪捷著:《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